

与八路军亲密合作的“贝大夫”

□ 孙现朴



法国人贝熙业，民国初年来华，在华先后工作生活40余年，是当时北京地区知名的西医大夫。他救死扶伤，悬壶济世，兴办教育，并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积极支持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

中国老百姓眼中的“贝大夫”

1872年，贝熙业出生于法国利莫赞大区的一个教师家庭。他求知欲强，学习刻苦努力，考入波尔多海军医学院并获医科博士，毕业后多次被派往海外任职。贝熙业医术精湛，来华后不久便成为北京城内西医界翘楚，多次为城内使节、上层人士、普通患者等治病、进行手术，缓解病人痛苦。长期定居北京后，贝熙业还在西山脚下清幽之地租赁土地，修筑私宅贝家花园，很快这里就成为附近百姓寻医问药的重要场所。贝熙业对普通百姓充满热爱，非常体谅农民，不论病情轻重，都认真诊治，被名士李石曾誉为“济世之医”。为方便穷苦百姓就医，他还将贝家花园防盗用的碉楼改为个人诊所，一楼为候诊室，二楼为诊疗室，三楼为药房，为周边村民义诊。如果需要进行大型手术，他还把病人接到北京城内中医医院进行治疗，当时他甚至把贵重的盘尼西林给普通百姓使用，以挽救生命。

看到贝家花园附近农村地区卫生条件堪忧，设施匮乏，贝熙业积极向当地百姓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农村卫生条件

有限，极易引发大规模传染性疾病。贝熙业及其好友在贝家花园所在的温泉地区宣讲卫生常识，宣传饭前便后洗手，坚持经常洗浴、及时清理腐烂物品等，并组织村民处理村内垃圾、打扫街道，保证公共场所的卫生。同时，他还指导当地政府建立农村诊所，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

经过多年努力，西山温泉地区旧貌换新颜，当地百姓与贝熙业感情越发深厚，亲切地称这位老外为“老贝”“贝大夫”。

积极为中国人培养医学人才

贝熙业一方面救死扶伤，开办诊所，另一方面积极投身教育事业，特别是对中国的医学教育投入很大精力。1913年贝熙业抵达中国后不久，就应聘到北洋海军医学堂担任教职，他努力把自己掌握的医学知识教授给学生，向学生们介绍、展示西方医学取得的最新成果。1916年华法教育会成立，贝熙业积极加入，并把推广赴法留学作为主要活动，引起巨大反响，一时间赴法勤工俭学浪潮席卷华夏。其后，在贝熙业等人的共同努力下，千余名中国学生走上了赴法勤工俭学之路，其中不少学生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先驱和新中国的领导者。

20世纪20年代，中法大学成立后，蔡元培出任首任校长，并成立法方董事会。贝熙业担任法方董事会成员、校医，积极为中法教育事业出谋划策，规划发展方向。在发展教育上，贝熙业展现出高昂的热情和斗志。从20世纪30年代起，贝熙业开始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医学人才的培养上。1932年，贝熙业出任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首任院长，开始了定期在北京和上海往返奔波的生活。就任院长伊始，贝熙业不但着手震旦大学医学院的建章立制，还积极筹款采购

先进医学设备，延聘多位留法医学博士担任教职。震旦大学强调用法国医学传统培养人才，实行严格的学习考试制度，优胜劣汰保证毕业生质量。优良的师资、严格的学风、科学的管理机制使震旦大学医学院很快在上海脱颖而出，在中国医学界声名鹊起。

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支援中国抗战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叫嚣“三个月占领中国”，中国军队不断败退。许多外国人担忧战争波及自身安全，离开了这片土地。但是，贝熙业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继续留在中国，并为抗战作出了很大贡献。

在国民党领导的政府军队溃败之际，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发展起来了，坚持对日作战。一支八路军游击队在西山脚下频繁出没。由于日军占领东南沿海，不断加紧对我实施物资封锁、禁运，造成各抗日根据地许多急需的药品，尤其是西药无法及时得到补充。在此背景下，中共驻晋察冀根据地代表联系贝熙业，希望他协助采购部分西药救治伤员。

贝熙业是北京城内享有盛誉的西医，是法国使馆的医生，有外交特许权，汽车悬挂外交牌照。日本人也知道贝熙业在西山脚下有私宅贝家花园，他需要开车往返于城里和贝家花园。鉴于其特殊的身份，日本人一般并不纠缠盘问。因而，贝熙业接受任务后经常从东城的大甜水井胡同住处出发，前往西山的贝家花园，帮助八路军运送急需的药品。地下交通员把在贝家花园拿到的药品，通过驴车等转运至抗日根据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对占领区的物资封锁、禁运越发严厉，汽油等成为日军重点监管的战略物资，已经难以从市面购买，贝熙业的汽车只能

停在车库。为了继续向平西抗日根据地输送紧缺的药品，他购买了自行车。从北京城内到西山脚下贝家花园骑车需要大半天时间，他不顾高龄，每次都骑自行车拖着几十公斤的药品，在颠簸的山路上骑行。从城里到贝家花园30多公里的路途，需要经过多个日军的检查哨所。他从不计较个人安危，全身心支持八路军，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事业。习近平总书记盛赞他的功绩，说他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运往中国抗日根据地。

贝熙业不仅帮助抗日根据地运送宝贵的药品，还协助多位反法西斯国际人士和地下工作者安全转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对英国和美国宣战，并在各地大肆逮捕英美人士。燕京大学的英国教授林迈可同情、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成为日本士兵逮捕的目标。1941年12月8日，为躲避日本人的抓捕，林迈可从燕京大学紧急出逃，投奔至西山脚下的贝家花园。在贝家花园短暂休整后，由地下交通员护送，经过长途跋涉进入抗日根据地，其后前往延安。1943年中共地下交通员黄浩身份暴露，为躲避日本宪兵队追击，黄浩仓促出城。贝熙业与黄浩相识已久，得知黄浩出逃后，派人将黄浩接到贝家花园，黄浩从那里奔向抗日根据地。此外，贝熙业还在贝家花园为负伤的八路军、游击队战士进行包扎和医治，有时还到附近山中医治抗日将士。

1954年10月，贝熙业乘船离开中国，返回法国，并在老家利莫赞大区旁边的奥维涅大区安家生活，于1958年去世。在华期间，贝熙业与北京画家吴似丹喜结连理，吴似丹为他开启了感悟中华文化的另一扇大门，并陪伴他至生命终点。

在动荡不安的岁月，贝熙业不畏艰险，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支持和帮助中国人民抗战，是中国人民不能忘记也不会忘记的朋友。

韩非看到的“人”的力量

□ 郑宁波

考察韩非对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认识，应当从考察韩非思想发生的社会历史条件入手，特别是要考察韩非在历史发展中代表谁，站在谁的立场上说话，为什么这样说，这样说话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从而才有了怎样新颖的天人观。在韩非之前，哲学家对客观规律性与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关系产生过诸多不同认识。在当时主要的思想派别即儒墨道法四家中，儒道两家倾向于强调天的力量，墨家虽然看到了人的力量，但具有明显的不彻底性。那么，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韩非是怎样看待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呢？

韩非批判儒墨各派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本取向，将其视为“愚诬之学”。他看到了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并用“道”和“理”来表达客观规律。“道者，万物之所以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举凡人的活动都该“守成理，因自然”，也就

是要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就难以成功，“非天时，虽十尧不能冬生一穗”。只有遵循客观规律才能成功，“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

在承认历史发展具有客观规律性的同时，韩非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价值。要建构起人在历史舞台上的主体性，必须首先重新思考被神秘化了的天。韩非将矛头指向在当时社会活动中具有很大权威性的占卜术。他用讽刺的口吻讲述赵燕两国根据占卜发动战争的故事：“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赵也。凿龟数策，兆曰‘大吉’，而以攻赵者，燕也。”赵国和燕国在攻打对方前占卜的结果都是大吉，他们根据占卜的结果攻打对方。韩非将这个尖锐的矛盾摆出来，战争必定要分输赢，两个大吉也就意味着双赢，这在实践中怎么能站住脚呢？结果是赵国战胜燕国。那么，燕国占卜出的大吉怎么解释？韩非讽刺道，此“非赵龟神而燕龟

欺也”。他认识到，造成这种荒谬景象的根源不在于两国的乌龟，而在于占卜本身；不是乌龟不可信，而是占卜本身不可信。韩非消解了占卜的神圣地位，告诉人们天是靠不住的，最可靠的乃是人。

韩非用“人事”表达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其与“天功”归为一对范畴。同时，他辨析了表征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不同要素及其地位。“明君之所以立功成名者四：一曰天时，二曰人心，三曰技能，四曰势位。”势位是客观条件，天時は客观规律，人心和技能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人的活动既要从客观实际出发又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指出的是，在韩非那里，主观能动性主要是指实践，而不只是言辞和理论。韩非鄙视儒家“听吾言则可以霸王”的虚幻言辞，历史发展不是靠嘴说出来的，而是靠人干出来的，人的主观能动性主要体现在现实的实践中。

韩非充分认识到历史活动中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意义，较之于先前遮蔽和压抑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诸家观点，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然，他的观点也存在缺陷，主要体现在他对两者之间“度”的把握上。他有时过分看重客观规律的力量，“因事之理则不劳而成”和“夫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等说法都过于绝对化。他之所以出现这种偏差，主要是他的政治立场使然。制度与人的关系具有两重性，当需要彰显人的力量的时候，自然会抬出人；当人的价值与制度相抵牾时，自然又会将隐匿在制度背后的“道”无限放大。这是韩非难以超越的困境。



（上接1版头条）

四川将紧紧抓住把人才“育出来、引进来、用起来”三个关键环节，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以人才“智高点”抢占发展“制高点”。以更实举措培育人才。实施“天府峨眉计划”“天府青城计划”，增设国防科技领域人才专项，对国家实验室、天府实验室等重大创新平台和国防科技领域等重点用人单位给予人才计划配额。加强青年人才培养储备，支持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培养研究生，设立博士后创新人才项目。构建现代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加大天府工匠培养力度，拓宽高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以更好服务引进人才。实施国家高端外国专家引进、天府高端引智计划，优化外国专家来川工作服务，落实外籍高层次人才出入境、停居留便利政策。拓展“天府英才卡”服务事项，完善人才安居就医、子女就学、家属就业等服务措施，让来川人才安心创业、顺心工作、舒心生活。以更大力度用好人才。坚持“破

四唯”和“立新标”并举，加快建立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赋予科研人员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和经费使用权。强化用人单位评价主体地位，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制度。采取“一事一议”方式，解决创新团队的科研立项、经费支持和团队核心成员的职务职称、薪酬待遇、服务保障等事项。发挥“双创”示范基地引导作用，大力培育创新创业集聚区，为各类人才施展才华搭建广阔舞台。

以推进全方位开放合作提升科技创新聚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越是面临封锁打压，越不能搞自我封闭、自我隔绝，而是要实施更加开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国际科技合作战略。四川地处“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联结点，是我国西向南向开放门户。中央把成渝地区列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四

极”之一，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四川更好畅联“一带”和“一路”。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开通国际（地区）航线131条，天府国际机场建成投运，实现“两场一体”运营，架起了与全球更好开展科技交流合作的“空中丝绸之路”。

四川将牢固树立世界眼光，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围绕构筑高效能开放通道枢纽、培育高能级开放市场主体、建设高层次开放合作平台、营造高标准开放发展环境制定“开放发展十条”政策，大力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更好对接全球创新网络，集聚国内国际创新资源。紧盯“点”。下好创新“先手棋”，支持省内企业在境外建立研发中心，在国际枢纽城市落子布点、抢滩布局。发挥中国—欧洲中心对欧综合合作平台作用，依托成都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打造国家层面中欧创新合作平台，建立线上、线下中欧协作合作网络。抓住“线”。争取开通更多国际航线，扩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创新合作朋友圈，共建联合

实验室、科技创新联盟和科技创新基地。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等国家（地区）科技合作。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区域的科技合作，联合重庆建设“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拓展“面”。支持各类创新主体跟进研究世界前沿科技，鼓励市州参与进博会、服贸会、高交会等国家级展会，支持国内外科研机构 and 人员参与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依托国际合作园区、自贸试验区、综合保税区等平台载体，打造高端创新资源承载地，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合作向更高水平发展。

以机制创新突破体制障碍提升科技创新保障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在西周，全社会按照亲宗尊尊的原则，实行世卿世禄制度，政治权力是世袭的，这就叫“大人世及以为礼”。在汉代，主要以察举制度选拔官吏，之后就是九品中正制。统治阶级在实行这些制度时，并非否定选贤举能，但政治权力却主要在贵族阶层中分配，人所熟知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就是这一情况的具体表现。到了隋炀帝大业二年，科举制度开始建立。科举制度的精髓是，面向全体平民选拔官吏，考试面前人人平等。

科举制度历隋唐宋元明清诸朝，止于清末的1905年，经历了1300年。科举制度的长期推行，对中国传统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也给中国传统社会带来重大变化。其中一个变化，就是科举制度的施行，使得精英的标准发生了重大变化，平民出身的士大夫阶层迅速兴起，替代了世家大族，成为维系社会运转的主干力量，在政治运行中发挥专业才干，在社会建构中承担引领地位，在文化传承中接续文脉。

通过科举制度，选拔了大批优秀人才，逐渐形成精英治国传统。据统计，在1300年间，由科举而选拔的进士就有近10万人。到了明清两朝，在500多年间，共选拔（文）进士51435人，平均每科（每三年一科）250多人，科举走向极盛。

在传统社会中，哪怕统治阶级想得再好，某种制度执行日久就会逐渐失灵和变坏，古人“有治人无治法”的说法，其意正在于此。比如，朱元璋曾设计了一整套自认为极为完善的统治制度。在地方，各省三司并立：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官员各司其职，平时相互监督，有事相互配合，其意甚美。但事实是，后来的官员们既不相互配合，也不相互监督，而是各贪各的。于是吏治败坏、民不堪命、动乱纷起。但是，在统治阶级肌体走向腐败之时，那些出身贫寒、懂得民间疾苦的新科进士们就像汨汨清泉，向这个腐败的肌体源源不断地注入新鲜血液，为统治阶级输送着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延续着统治集团的政治生命。

在科举制度实行之前，贵族长期把持和瓜分着选官任官等政治权力，深刻影响着政局和社会风尚。总的来说，整个社会是贵族社会。贵族并非一无是处，比如，东汉时期形成的士族，都是饱读诗书的书香门第。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力推动下，熟读经书的读书人入朝做官，又和本宗族紧密结合为一体，成为当时的士族阶层。这些士族把持政治权力，左右舆论方向，在经济上也十分强大，是当地的名门大族。因此，士族就是伴随独尊儒术而产生的新贵族。士族为了不坠家声，长期保持贵族地位，就要维持良好族风、团结凝聚族人，并不断培养出读书做官的后代。从东汉以后出现的诫子书和家诫、家训等，都反映了士族对宗族成员的约束和要求。但是，士族长期把持政治权力，既不利于社会公平，也不利于选贤任能，更不利于最高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因此，科举制度应运而生，势在必行。

科举制与中国独特的士大夫阶层

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对贵族阶层的冲击是多方面的。首先，平民阶层特别是寒门子弟通过科举为官，登上政治舞台，产生政治影响，国家的政治权力被更多的社会阶层所占有。其次，随着科举对社会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从中晚唐开始，人们的婚姻观念从择门第、重门阀向重科名转变，富贵之家争相以科举及第者为婿，这便壮大了寒族的势力，此消彼长地动摇着士族的根基。再次，通过科举为官的士族精英必然离开故土，其家庭也要向京都地区和其他城市迁徙，并与故乡的宗族关系日见疏远，士族的没落就成了必然。

宗族组织最重要的标志是祠堂和族谱。祠堂是祭祀祖先的地方。在唐以前，平民只能“祭于寝”，也即在自己住的房子里祭祀自己的祖先，只有官员在经政府批准后可以设立祭祀祖先的家庙。平民也没有族谱，唐以前的族谱是由政府主修并面向贵族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区别门第、选拔官吏。从宋代开始，平民阶层开始以宗族为单位建立祠堂，并以“尊祖、敬宗、收族”为目的编修各自的族谱。其间，北宋的欧阳修和南宋的朱熹等人为宗族制定了各种规制，对宗族的发展影响较大。比如，欧阳修创立的五世族谱体例为后世所遵循，直到今天，还有以是否出五服来区别亲疏的习惯。朱熹提出，30年不修谱，是谓不孝，所以后世族谱30年一修成为惯例。伴随着族谱、祠堂的兴盛，宗族内部的管理制度也逐渐形成、完善，族长不仅具有管理宗族的族权，而且为政府所支持。另外，族训、族田、义学等也陆续发展起来。到了明清时期，宗族组织发展到了巅峰。

合争取、协同实施机制，力争落地一个就带动一片。勇于“闯创试”。开展职务科技成果转化前非资产化管理改革试点，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建立科研人员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保障机制，鼓励科研人员勇闯创新“无人区”。实施“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开展经费使用“包干制”试点，让有真才实学的科研人员脱颖而出。完善尽职尽责的容错机制，提高创新失败容忍度，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环境。

百年风华正茂，百年奋斗不止。我们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接续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楷模为国建功的无上荣光，强化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坚定科技工作者的初心使命意识，引导科技工作者勇攀科学高峰。培育崇尚科学的创新文化，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大力推动科学普及，广泛宣传科技工作者勇于探索、献身科学的生动事迹，在全社会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浓厚氛围。